

破山禪師評傳

熊少华著



《破山海明评传》为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一个禅宗大师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剖析，去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引发一些有待重新探索、重新认识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等问题，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连接点。笔者将《破山年谱》和《破山语录》作为第一手资料，并结合大量相关的地方史志、佛教史料、历史资料，来进行叙述、综合、分析和评论。以破山海明鲜为人知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分期分类论述，展示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发展、完善的复杂过程和崇高的人格魅力，并揭示出当时的历史形势、社会心理特征，国民的生存状况、佛教发展方向及思想文化动态。

箇事从来在者里
非空非内亦非外
若人向此开双眼
任是刀山浑不碍

破山老人为
非外禅人拈出

河边淑气迎芳草
林下轻风带落梅

破山明

箇事从来在者里
非空非内亦非外
若人向此开双眼
任是刀山浑不碍

破山老人
拈出

河边淑气迎芳草
林下轻风带落梅

破山海明评传(暂定名)

目 录

导 言	明末清初的文化生态与破山海明的意义	()
第一章	佛心初萌的少儿时期(1597—1616年)	()
一、	万历朝局	()
二、	家族渊源	()
三、	少儿生活	()
四、	早结佛缘	()
第二章	漫游求学的青年时期(1617—1632)	()
一、	上下求索	()
二、	破头山上	()
三、	大师门庭	()
四、	西子湖畔	()
五、	湛然门下	()
六、	“密云弥布”	()
七、	法门纷争	()
八、	入主东塔	()
九、	千里还蜀	()
第三章	开宗立派的万峰时期(1633年—1642年)	()
一、	梁山古邑	()
二、	“万峰崛起”	()
三、	“僧侣云臻”	()
四、	履痕处处	()
五、	力排“聚云”	()
六、	开宗立派	()
第四章	明清交替的流亡时期(1643年—1652年)	()
一、	天下大乱	()
二、	身陷“贼”营	()
三、	悲惨世界	()
四、	剩水残山	()
五、	南滨岁月	()
六、	吕大相国	()
七、	破戒止杀	()
八、	长歌当哭	()
九、	“夔东十三家”	()
十、	劫后余生	()
第五章	大道圆满的双桂时期(1653年—1666年)	()

一、“佐明将军”	()
二、双桂祖庭	()
三、“学业禅堂”	()
四、沟通东南	()
五、法化西南	()
六、封疆大吏	()
七、南明挽歌	()
八、泰山北斗	()
九、涅槃境界	()
十、衣钵流芳	()
第六章 从“痛棒到底”到“内外贯通”	
——破山佛学思想的兼容精神	()
一、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	()
二、“恶辣钳锤”与“持经念佛”的圆融	()
三、禅、净、教、戒的统一	()
四、慈悲情怀与宗教实践	()
第七章 “五百年来见几曾”	
——破山书法艺术的超然境界	()
第八章 任达——沉郁——通脱	
——破山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	()
一、任达率真——早期诗歌的浪漫情调	()
二、悲怆沉郁——中期诗歌的写实风格	()
三、自然圆成——晚期诗歌的空灵境界	()
附 录	()
一、破山海明禅师行状	(清) 丈雪通醉()
二、破山和尚塔铭	(清) 刘道开()
三、《四川通志·海明传》(清朝嘉庆本)	()
四、破山海明年表	()
后记	()

导 言

明末清初的文化生态与破山海明的意义

一代宗师破山海明以他七十年的人生经历,跨越十六、十七两个世纪,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历程和兼容并包的佛学思想、浑朴超逸的书法艺术、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卓然独立,在明清之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他以川东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为中心,通过30余年卓越的传教活动,使四川直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佛教“兴盛到历史的顶点”(《四川禅宗史概述》)(1),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最后活跃及其终结”(2)的代表性人物。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无论社会经济结构或是思想文化形态,都处于新旧代谢的特殊阶段,封建母体内发原生的新经济萌芽正催生着早期启蒙思潮的自动滋生,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个性解放形同潮流,民主意识初露端倪。世态的变迁,社会的动荡,思潮的迭起,文化的多元化趋向,一个个思想家、文学艺术派别应运而生,此起彼伏,好一似“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影响所及,使得17世纪的明清之交在思想史上达到与纪元前百家争鸣的周秦时代相媲美的程度。但此时此刻的人们,又往往陷入“新的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这一历史局限的痛苦之中。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十分透彻地分析道: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使明朝历史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形成,物资交流的扩大,东部地区得风气之先,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荣局面。但专制的君主制度、庞大的官僚机构,贪婪的食利阶层,已将“大明江山”蚕食殆尽。进入晚明后,张居正的改革已经“人亡政息”,一去不复返了;李贽充当了封建礼教和伦理至上主义的牺牲品,不得善终;海瑞之类的清官成为官场的笑料,变得孤掌难鸣而无所作为;连信誓旦旦的要重振雄风的崇祯帝也没有办法,十七年内换了50个首辅,“治国无能”、“营私有术”的臣僚都令他大失所望。政令无法畅通,只好屡次下《罪己诏》,对身为百官之首的自己进行不断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谴责,博得个“明君”的雅誉,最后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旨,自缢于景山脚下。人们不由同情而发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感叹,李自成在他的《登极诏》中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场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公绝少。”(3)“臣尽行私”,正道出了明以腐败亡国的根本原因。许苏民在《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晚明社会主要矛盾探析》中总结道:

一部晚明史,交织着人民大众与皇权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早期市民阶层与皇权专制的矛盾、改革与意识形态的矛盾。(4)

在官僚阶层灯红酒绿、日食万金的奢靡之中,中西部地区则是连年饥荒,“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掘山中石块而食”(《明季北略》)的惨状。东西部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朝廷昏暗、官僚腐败、贫富悬殊等等复杂因素汇合而形成的重重矛盾之中所导致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中西部农民起义一呼百应,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将朱明王朝给葬送了。“与其说这是李自成的成功,还不如说是朱明政权的自然崩溃比较妥当”(吴晗《论晚明“流寇”》)。但李自成不过是紫禁城里的匆匆过客。张献忠亦如过眼云烟,东北关外的游牧民族很快即入主中原,一时间狼烟四起,民不聊生。值此国破家亡之秋,弥漫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便是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种“通过一姓的兴衰,朝代的改易,透露出对整个人生的空幻之感”。李先生一针见血地说道:

落后的少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被全面打下去,那几位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传统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

明朝灭亡,清朝专政,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就也毁于一旦,中国社会出现了倒退。满清政府入关之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令”、“文字狱”种种暴政,也给人们心头蒙上了厚厚的阴影。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精辟而准确地指出: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神圣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5)

沉闷、压抑、惶恐、厌倦,悲春秋之易逝,觉人生之无常。从“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6)到“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7),从“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8)到“早已觉来浑是梦,譬如死去未曾埋”(9)……这岂止是社会的动荡,分明是人心的混乱。没有依靠,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人生空幻”遂为“时代感伤”,暮鼓晨钟更显佛祖魅力。尤其是面对异族统治的屈辱无力回天万般无奈之际,有志之士纷纷逃入佛门,寻求寄身之地。他们谈禅论道,吟诗作画,又以此作为精神的避难所,或抒发情怀,或排遣忧愤,或直接将笔墨作“投枪”作“匕首”,追怀故国,痛斥清廷,一时之间高僧云集,大师辈出,最后一次将佛教推向了新的高峰。破山正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

然而,破山又不仅仅是藏之深山独善其身的人。《中国禅宗通史》说:

清初川、黔、滇地区,是全国抗清力量最强,坚持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也是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最大的地区之一。(破山)海明禅系能在这里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与这种形势有关。

破山出生于西南的四川大竹,为寻求佛法,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南佛教繁盛之地的浙江,遍访高僧,博采众长。他取法既高,天资聪慧,用功尤勤,很快即为东南佛门所瞩目,被视为光大法门的后起之秀和希望之星。但破山不屑于纷繁错综的佛门争斗,决定远离这热闹的是非之地,毅然还蜀。

由西南到东南,再由东南回到西南,学成归来身负盛名的破山便开始了他在川东梁山的传法时期,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1633年,西南佛法的兴盛由此而开端:“破山海明返回巴蜀传禅三十余年,推动禅学在川、滇、黔的发展”(《中国禅宗通史·大事纪》)。破山渊源于全国佛门中影响最大的天童派,方其回蜀之初,“天童衣钵正在破山”(10)几乎已成共识,换言之,破山堪称当时全国佛坛执牛耳的人物。1644年,伴随改朝换代而来的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活动,在全国范围拉开序幕。斗争最为激烈,时间最为漫长,伤害最为惨重的又是四川,而川东三峡地区则是这场民族斗争的终结点和落幕处。所以明清的持续战乱以四川为重灾区,川东更是重中之重。“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人为的战乱和自然的灾荒使这一方土地的人民过着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生活。破山身逢其乱,以一个宗教领袖的胸怀,情系生民,关注现实,感化四方,为平息战火、劝人止杀不惜放弃教规戒律,甚至置之生命于度外,因此备受万民景仰。1653年创建双桂禅院,大开法堂,广纳门徒,钳锤子弟,力整宗纲,使得道风大振,双桂堂遂为西南禅宗祖庭,弟子分化四方,中兴佛法,数十年间西南佛教已成燎原之势。以双桂堂得名的“双桂禅系”传衍至今,构成了近现代四川及西南汉地佛教的主体”(《四川禅宗史概述》)。从朝廷相国、州县官吏、文人学士、军阀土匪,甚至地痞流氓都趋之若鹜,从破山皈依佛门,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而南明政权、清朝政府、地方武装、农民领袖种种势力又采取种种手段拉拢破山,以取得社会的认可。破山成为“宰官拜其座下,将军奉其教律”(《破山大师圜碑并铭》)、“上自朝廷,下及委巷,近而中夏,远而外国,罔不闻知”(《破山和尚塔

铭》)(11),被尊为“古佛出世”、“小释迦”等称号的大师。因此,破山每到一地,往往出现人们“驰逐瞻仰”,“争先拜于街市,乃至屠儿亦皆稽首”(《破山年谱》)的盛况。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对破山及其门徒在西南的传法进行了详实的考证,被陈寅恪称为第一部“完善之宗教史”(见《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从少年时期的“不以诗书为事”,“自此恒觅佛书”,悲观厌世,需要佛祖的“救渡”;到青年时期浪迹天涯,陶醉在禅悦之中,“极快活,极自在”,得以“自渡”;再到中年时期置身战乱,慈悲为怀,开斋止杀以“渡人”,由此进入到晚年时期大道圆满的境界。在政治态度上,破山由奉明室为正宗,痛恨农民起义的颠覆,到坚定不移的反清复明立场,再到久乱思治,放弃初衷,将“苏民困”和“启世贤”的希望寄托于清朝政府。其复杂的心路历程、生活感受和思想见解真实反映在他的二十一卷的著作《破山明禅师语录》之中。

也是时代造就了破山海明,天崩地解,世乱年荒,祸福无定,生死无常,明朝大势已去,对清廷的斗争也无异于蚍蜉撼树与螳臂挡车,反清复明无望,雪耻保节难成。而清朝“自入关以后,于政治则取高压之策,凡臣工可互相诋诮,而绝不容有指斥乘舆之语,又不喜人民议政或干与政治”(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在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多事之秋,寻求心灵的净土,获得精神的安慰业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需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时此刻的破山,犹如黑夜中的明灯,以其精神的广厦,安抚着千千万万游荡的灵魂。其特殊的意义也由此而突显出来:

首先,兼容并包的思想促使佛门禅学在清初为之一振,再次活跃起来。破山晚年按照“养育贤才,陶铸后学,继往开来”,开办“学业丛林”的宗旨创建的双桂堂,不啻于佛法推广基地与禅学交流中心。他既提倡儒、释、道的圆融共通,比如他说“既从释也又从儒,二教何尝病有无”(12),又坚持禅、教、净、戒的统一,说:“出于口为教,运于心为禅,轨乎身为律,三法一人行”(13),“信得参禅,即立志参禅;信得念佛,即立志念佛,虽顿渐不同,出生死心一也”(14);他既主张“修行戒为本”而“无戒不持”,又反对死守戒律,因循守旧,并说:“坐禅若得那伽定,酒肆房总不妨”(15)。可见其思想之开放;他既运用高深莫测的玄言妙语和棒喝机锋,来启迪禅众,又大开门户,简化佛法教义,鼓励人们只须念佛,便能往生净土。如此种种,作为佛法的积大成者,破山秉承了两宋以来三教合一和明中叶以来个性解放的潮流,但他似乎走得更远,放得更开。无疑地,他的这种做法既能迎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又能满足中下阶层信众的需求,还能取得官府的认同。同时,又起到了淡化矛盾、解脱痛苦、平衡心态的作用,化悲愤为平静,视变易如寻常,托情怀于空门,而“空门无法不包罗,谁是谁非肯恁么”,“顿脱樊笼到我家,无拘无束混龙蛇”(16),来去自由,无牵无挂,淡远通脱,众生平等的佛院禅门就是理想的天国与圆满的归宿。于是,前来膜拜破山之人“远近趋风”、“僧侣云臻”、“万指围绕”(17),例如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考贵州一省高僧 121 人,其中破山派就有 110 人,其他派系或一二人,或四五人。这 110 名破山的法子法孙都是有诗文和“语录”传世的高僧。而得破山剃度传法的、受其影响的善男信女则无法计其数。

其次,息事宁人的态度促使社会尽快结束动荡,顺应历史变迁。破山曾给明朝吏部尚书牟秉素回信说,动乱不堪的局面不是天意而是人为,“实是人之迷甚,痴心作业,恶之使然,的非天地有灾祸于人也”(18)。表现出对作恶者的愤慨。面对战乱,他痛苦地叹息:“国运何时能太平”?乞求和平的早日到来。他又涉足现实,奔走呼号,与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将军”、“总兵”们和光同尘,为他们讲解“佛祖因缘”,“说罪福受报,好丑皆以不杀为至德”,教导他们“上帝好生,宜护惜残黎”,从善积德。并以“开斋止杀”的举动发出了“老僧为百万生灵,忍惜如来一戒乎”(见《四川通志》、《梁山县志》等)这类震古铄今的语言,给久以麻木的社会以震撼和警醒,唤起那些杀人恶魔的良知与人性,使众多生灵免遭涂炭,曲折地显示了普度众生的佛门宗旨,重塑了佛门高僧的形象。这一事件引起

极大的社会反响,众多的史料如嘉庆本《四川通志》、彭孙贻《流寇志》、吴伟业《绥寇纪略》、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等竞相记载,既把它作为农民军“屠蜀”的罪证,又表现出人们对这场杀人游戏的怨恨和对刽子手们鄙视的心态。以后,破山接受清朝陕西、四川总督李国英的友谊,在给李的诗中有“重开巴国苏民困,再造夔门启世贤”、“人寿同天寿,民安即国安”(19)的诗句,就是表明态度,希望他要治理好这片土地,就得安民苏困,不要再当杀手。清朝多年未能解决的西南归属问题在李国英手里终于划上了句号。而李国英所施行的也正是他所谓的“仁政”。破山在给另一个有爱民如子之誉的达州刺史写信说,你这是“不在做官,乃在做佛也”(20)。对其亲民政策予以表彰。

最后,超然物外的心理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在破山看来,佛门有广阔的天地和丰富的内容,是非、得失、苦乐、物我,放下即是解脱,在佛在官,出世入世均无区别,只要内心空静,淡泊名利,参透生死,便能获得精神的自由。“做官做佛两忘情,是个无依出格人。今日已经双桂手,锋刀扫尽绝红尘”(21)。破山还以偈为诗,创作了大量的禅意诗,透露出他放浪形骸之外、游心寂寞之中,远是非而亲自然的理想。这些诗淡远清新,空灵通透,意境深邃,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响,陶然于禅悦之中。无疑给清初在政治高压的形势之下的诗坛开辟了一条出路,在稍后风行天下的“神韵”说诗歌流派(有人认为是与避祸有关),大概不能说与之没有关系。因为破山师徒中间继感时伤世的主题后,已经率先流行这种清空淡远、“脱离现实”的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相标榜的诗风了。

破山还以书法作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手段。不拘成法,不假雕饰,横涂竖抹,挥洒自如。因此,受其影响而相与交往的官场中人和耳濡目染的法门弟子,长于此道者,便大有人在,留下了众多的作品传之后世。郭沫若有“丈雪破山人已渺,几行遗墨见薪传”的诗句;启功有“憨山清后破山明,五百年来见几曾。笔法晋唐元莫二,当机文董不如僧”(22)的诗,足见追慕之情。

破山俨然是这一时期或至少是西南这一地区的精神领袖,象进士出身的南明相国吕大器与破山接触后,“两膝不待折而自屈”(23),拜倒在破山门下的例子不胜枚举。吴三桂千里迢迢将精心准备的“凡法座之可严饰者,无不备焉”(《破山年谱》)的全套佛门用品,遣派“专使”送往双桂堂中,表示出与破山的某种联系。“海明在巴蜀传禅三十余年,无论在佛教界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巴蜀之外,海明也被视为禅学正宗”(24)。刘道开在《破山和尚塔铭》中感慨道:“予何言?师之道德在天下,天下之人能言之也!操履在丛林,丛林之人能言之也!”

前清的几位帝王在世入面前有意无意显示出对佛教的崇尚,尤其是雍正“以禅门宗匠自居”,直接参与佛门内部的争端,“不惜以人天子与匹夫搏”(25),更反映出清帝微妙的心态。随着朝廷的频频干预,佛门逐渐变为政治的附庸和装点山水的景观,丧失其文化与思辨的意义,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没有生气的躯壳了。

《中国禅宗通史》将清初作为“最后的活跃及其终结”,这一判断与陈垣所说的“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26)相吻合。这种活跃,显然是由明末清初在社会巨变的重重矛盾之中,现实与思想的混乱所促成的。陈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深刻地说:“今日追述当时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那么,据此为前提去考察一代宗师破山海明的生活行迹和精神世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于古于今于后,或许并非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注释:

(1)见《巴蜀禅灯录》,四川省佛协、省宗教志办编,1992年6月成都出版社出版。

(2)(24)见《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著,1993年8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3)见彭孙贻《流寇志》卷十。

- (4)见《明清文化名丛书》1998年8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
- (6)见孔尚任《桃花扇》。
- (7)郑燮题朱耷画
- (8)朱彝尊《自题词集》。
- (9)引自陈垣《清初僧诤记》徐心韦《自题》诗。
- (10)(17)见《破山年谱》、《中国禅宗通史》等。
- (11)《破山大师圜碑并铭》，朱之俊撰，载入《破山语录》卷二十一。《破山和尚塔铭》，刘道开撰，收入嘉庆《四川通志》、《梁山县志》。
- (12)(13)(14)(15)(16)(18)(19)(20)(21)见《破山语录》卷六、八、十三、十五、十七、十九。
- (23)见《破山明禅师行状》，丈雪撰，收入《破山语录》卷二十一，
- (22)见《论书百绝》，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
- (25)(26)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1962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

第一章 佛心初萌的少儿时期

一、万历朝局

朱明王朝走到万历年间，好比一个病入膏肓的废人，各种问题都凸显出来，百孔千疮，已多有不祥之兆。论明史者习惯称万历朝为晚明的开端，更有甚者，将张居正被彻底清算的看似寻常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明王朝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朱翊钧从十岁即位为君，到五十八岁去世，做了四十八年的天子，是明代十六帝中在位时间最为长久的皇帝。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给大明江山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就朱翊钧本人而言，也是非常地耐人寻味。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开门见山地说：“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些在当时之世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的可悲的结局，足以说明那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失败的时代。

朱翊钧原本一个是聪明而又早熟的君主，即位之初的十年，励精图治，勤于朝政，使天下出现百废俱兴的繁荣局面。他胸怀大志，好学多思，博览各朝实录史记，常与学士们讨论历史上治乱成败、盛衰兴亡的教训。但这时，朱明王朝的大权由张居正所独揽。张居正既是首席大学士，又是万历的导师和保护人。他精力充沛，手段高强，而且位重望尊，为人严厉。身为皇帝的万历对他虽有不满却又需要，在恭敬中甚至还有几分畏惧，大小事务，均由张居正定夺。久而久之，对他的敬重变成了对他的依赖，皇帝几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装饰品。平心而论，张居正的确是少有的贤臣良相，在朝政的治理、边塞的防范、人才的任用、财税的增收以及他那著名的一条鞭法等等，都有令人称道的政绩。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评价说：“他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导定出了一套办法，用它来铲除官场上的许多积弊，”但是，“这些无往而不利情况，更让他沾沾自喜，越发把自己看成了个非凡的人物，使他养成了威福自恣，对人或对事常是以自己的喜怒为转移的情况，并且成了个严于责人，拙于律己的人。”张居正实在是太不可一世，以至于他死后还余威不减当年。万历为了迅速从束缚他十余年的“元辅张先生”的阴影里走出，不露声色地导演了一场倒张运动。因大

多数官员曾受到过张居正的压制责罚,所以,这场运动一呼百应,很快就成功了,另一个制约皇帝的显赫人物冯保也被驱赶出京。

张居正被倒了,冯保被赶了,万历却有了新的困惑。《万历十五年》说:“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其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他所依靠来治理天下的群臣百官,是一个庞大的阵营,如一个宽广的网络,有一种惊人的力量,他们虽然在皇帝的金銮宝座前俯首跪拜,却有无法抵挡的魔力使皇帝听从摆布、丧失个性从而受到愚弄变得昏庸,乖乖地进入到那一整套千年不变的游戏规则之中,彼此彼此,相融相洽。其实,张居正之所以遭到齐心协力地清算,就是因为他胆敢跳出这个神秘的圈子,触犯大家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万历帝在这出倒张的戏中,充当的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为人服务的丑角。

对朝廷之中复杂而又单调的斗争,繁琐而又疲惫的事务,万历帝失去了最初的兴趣和信心,尤其是爱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在群臣们各种方式的干预中,不能如愿以偿的被立为太子后,他更是心灰意冷。对生活的厌倦,使他懒于朝政,不思进取,更用贪图享乐、沉缅酒色来发泄私愤。明朝象只无头苍蝇,呈现出茫然无序的状态,一时内忧外患,矛盾迭起,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万帝皇帝朱翊钧也从此留下了一个“昏君”的骂名。

君主荒怠,宦官擅权,党争激烈,盘剥加剧,各种制度均缺乏应有的约束效力,道德失范,管理失控,官场失态,这种状况象瘟疫一样,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于是百官旷职,国事日非,政治形势急速恶化。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撰文痛斥元朝末年政治的种种腐败已不可救药,谓其:“盗起而不知御,民贫而不知救,法~~救~~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卖柑者言》),相比之下,明朝末年则有过之无不及。那么,它末日的到来又会有多远呢?

四川的情况更为糟糕,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富悬殊,连年灾荒,使得这个相对东南来说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危机非常突出。万历二十四年(1696)后,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形同疯狗,强征暴敛,收取苛捐杂税,及至买卖柴火、蔬菜都要上税。《四川简史》说:“从万历到崇祯,四川灾荒连年。一六一〇年,全蜀荒旱,殍死无数,赤地千里,城野半空。一六一八年,荧水忽涨十余丈,田庐漂没,颗粒无收。明朝晚朝,四川人民在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这一时期,兵变和暴乱也不断发生,最为突出的就是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抚司杨应龙的武装叛乱,时间长达六年,横行川、黔、鄂等地。叛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一代宗师破山海明(1597—1666)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年月。正如他后来所言:“予生不辰,处于恶世”(《破山明禅师语录》,以下简称《破山语录》)。

破山海明即蹇栋宇的生年——万历二十五年(1697)——正是杨应龙的叛军最嚣张的时候,也正是万历帝刚刚走完他为君一半的路程,前面的24年已经播下了足够的混乱与动荡的种子,以后的24年他仍将“播种”并营造其所需的土壤与气候。这样的时代与蹇栋宇日后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家族渊源

这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午时,四川东部偏远的大竹县里一个偏远的乡村,春寒料峭,冷若冰霜。但一个小生命的降临却给一个并不殷实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这不仅因为初生儿是男婴,更因为从怀孕到出生,均有非同寻常的迹象出现,《梁山县志·艺文志》说其“母梦日出而生,”且生得“眉目挺秀”,仪表不凡。但《四川通志》说其“母妊十五日而生”(《海明传》),显然不足为信。家中男主人姓蹇名宏,与妻徐氏虽然早已有了一个儿子,但似乎并无多大造

化。蹇宏满腹的心事，有志不能伸，只落得个老大徒伤悲的尴尬。次子的出生便令他大喜过望，所以为儿子起名为“栋宇”，寄希望于他日后光耀门庭，重振家声。

按《双桂破山明禅师年谱》(以下简称为《破山年谱》)所载：“姓蹇氏，本渝州忠定公后裔。”又据《破山和尚塔铭》“俗籍渝城，移之大竹。元勋奕叶，相传蹇忠定之裔孙；古佛因缘，人说昭觉勤之转世。”再据《破山明禅师行状》等，均称其为“渝州蹇氏族也”。渝州蹇氏即明初大学士蹇义一族。自蹇义后，“元勋奕叶”，世代为官，虽享尽荣华富贵，却难免有衰落的一天。更有甚者，有的还流徙到了异地，蹇宏便是其中沦落在大竹的一个。难怪他望子成龙心切，原来大有深意存焉。

既然蹇义为其先祀，则须略作介绍。《明史·蹇义传》载：“蹇义，字宜之，巴(今重庆市)人，初名。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奏事称旨。帝曰：‘汝蹇叔后乎’？顿首不敢对。帝嘉其诚笃，为更名‘义’，手书赐之。满三载当迁，特令满九载，曰：‘朕且用义’。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尝忤色”。中书舍人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历代地位颇高，而洪武皇帝朱元璋更垂青于这位姓蹇的四川人。这位集“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老皇上是历代皇帝中出身最为低贱的帝王，虽然寡文少墨，自幼与僧侣流民为伍，后来出生入死，于马上得天下，但蹇叔哭师之类的典故也还是耳熟的，况且蹇姓之人历来就少，便很容易从眼前这位能言善处、年轻老成的蹇舍人而联想起战国的蹇叔。加上这时天下已定，胡党已除，皇位已稳，心情自然就好，便兴之所致地与臣僚相戏。但蹇舍人冷不防被这一问，有些不知所措，只好鞠躬顿首，缄口不语。皇上见他诚实谦恭，越发器重，乘兴要为他更名，说“宜”不如“义”好，就叫蹇义吧，并手书二字以赐。天子赐名已属难得，而且以“义”字相赠，就更非寻常了。自孔孟以来，“义”是作为人的行为选择的最高标准。——这或许是皇上的一次偶然行为，但蹇义之大名则足以远播了。

从南京到迁都北京，从洪武到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蹇义受到六位帝王的礼遇，尽享高官厚禄。其中，仁宗帝为彰其德，特赐银章一枚，又赐御书道：

曩朕监国，卿以先朝旧臣，日侍左右。两京肇建，政务方殷，卿劳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余年，夷险一节。朕承大统，赞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笃念不忘，兹以已意，创制“蹇忠贞印”赐卿，俾藏于家，传之后世，知朕君臣共济艰难，相与有成也。(《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这真是荫及子孙光被九州的恩赐了。到了宣德年间，皇帝又赐予印文为“忠厚宽宏”的银章一枚，并为其营建新第宅于京城文明门内。正统元年，蹇义无疾而终，享年七十三岁。新即位的皇帝“赠太师，谥忠定”，后人遂以忠定公相称。“子(蹇)英，有诗名，以荫为尚宝司丞，历官太常少卿。孙(蹇)霆，成化乙未进士，由侍御出为宪金”……。当此之时，其家族在原籍重庆就堪称首屈一指的望族，号称“蹇半城”。据《重庆市市中区志》载：“重庆市中区天官街、蹇家桥、蹇家巷都以蹇义的官名或姓氏命名的。”

这种家庭往往会枝繁叶茂，很快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天长日久，盛极而衰又是难以逃脱的命运，部分分支甚至整个家族中落破败、一蹶不振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然而，毕竟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家史，作为裔孙的蹇宏不能不自觉惭愧，但他从未甘于沉沦，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苍天有眼，再添一儿，来寄托他终生的希望，成就他的未尽之业。但儿子蹇栋宇日后所走的路，和父亲大人的想法，竟是如此的大相庭径。

三、少儿生活

大竹县位于四川东部的平行岭谷区内的浅丘地带，又称“竹阳”，“邑界多产大竹为名”，（《四川通志·輿地志》），它“南引巴（山）渝（水），北连通（州）达（州）”，“川据渠（江）渝（江）之上，陆当夔（州）达（州）之冲，近拥四阁以巍峨，远拱三山而腾赴”。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因地处偏远，群山阻隔，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

根据《破山年谱》的记载，蹇栋宇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渐渐长大。他“形貌端正，七处平满”，有一副人见人爱的相貌。“只是终日不语”，直到过了四岁、五岁、六岁的年龄，依然未能象一般儿童一样发音说话，这不能不让望子成龙的父母伤透脑筋，——大概哑巴无疑了。

在长到七岁的时候，偶然听到邻居有人念诵佛家的《金刚经》，至“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小小的蹇栋宇突然张嘴说话，“随声学诵”起来。父母惊喜交加，兴奋之余，奔走相告，说：“我子说话了也”，识者曰：“此儿不可测”。

天生聪明的蹇栋宇一旦说话，让人倍觉乖巧和机智。第二年父母便把他送进了乡校，目的是要他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通过科举来达到先贵后富，富贵荣昌的目标。当时当地，乡下孩子读书的绝少，这一方面说明蹇宏对儿子寄托的厚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蹇家大约还算得上温饱有余的中产阶级，但也仅此而已，他是没有实力将先生请来作家塾的。

乡校的功课对蹇栋宇来说，绝非难事，他具有独特的领悟和惊人的记忆能力。课余特爱提笔写字，尤其喜欢写一竖一短横底下再加一长横的“上”字。这似乎是他日后生活的预兆。到十岁那年，偶然遇到一个僧人给人讲解“世出世间法”，引起他浓厚的兴趣，比起乡校那些枯燥的诗云子曰和八股文，生动何止十倍。于是，他四处寻找，弄来一些佛家图书，独自阅览。当然，这只是兴趣的使然，对于那些深奥莫测的玄言妙语，他或许似懂非懂，或许根本不知所云。但冥冥之中，却养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人的心性，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愈来愈强烈了。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身边那些呆头呆脑苦读死书的同学，看待满口之乎者也的教书先生；他开始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欢乐、没有生机的无聊之地，一个禁锢身心的牢笼。——心灵深处，他已开始了对人生的思索。

父母大概警觉到了蹇栋宇的异常，便自行作主，早早地包办成就了他的婚姻大事，好让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定程序中明白自己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十三岁。

家庭生活又岂能限制蹇栋宇的思想，他人不去安家理财，出不去应酬世务，只是一味地放浪不经，任其个性的发展。父母煞费苦心，为他提前完婚，成家立业，志在丕振家声，结果反而让他过早地厌倦了太现实，太繁琐也太无聊的世俗生活。父母真是无可奈何了，责骂道：“汝不理家务，他日不知成个什么人”。他却不以为然地答道：“看那泥塑木雕的佛，尚有许多人供养，何况男子志在四方，乌可限定耶”。

四、早结佛缘

时值蹇栋宇十四岁，即他婚后的第二年，其“父母相继而背”。双亲的去世有点事出突然，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他“偕兄哀痛迫切，尽殡葬之礼”。从此，他行径更加怪异，或痛哭流涕，或静坐默想，或长吁短叹，或独行独往。他原本体质虚弱而多病，天生营养不良，特别是十八岁那年，几次徘徊于生死的边缘，终日僵卧病榻，总是思绪不断。他早已无心于科举致仕与发家致富了，什么齐家治国，

什么经邦济世，什么功名利禄，与他是那样的渺茫和空泛，也是那样的无聊而无谓。他不想亦步亦趋，皓首穷经，去落得范进中举的悲哀。这时，他只想活得自在轻松，活得符合己意，出家的想法油然而生。按照传统观念，父死则长子为父，所以他“每以出尘之念白兄”，表明态度，以期征得同意，而“兄不许”。兄长的反对没有理由又理所当然，但他既然心有所属，因此，其“志终亦不改”。

这期间，他常常独自出游，“远涉名山大川，一日忽归，遂将妻室安置毕，兄以师（蹇栋宇）为不肖，视如路人，师（同前）愈喜游历，更不思归”。按说来，他“亦曾娶妻而生子”（《破山明禅师行状》），已经为人之父，更应慎重行事，特别是出家之事尤其须权衡再三。按他日后的生活态度，他绝非是游手好闲，没有责任感的人。可以说，他的出家是为寻求思想的解放与灵魂的皈依，从而逃避科举的痛苦与世俗的束缚。根据《年谱》分析，还在乡校时，他就“不以诗书为事”；“自此恒觅佛书”，“但喜多书上字，先生每加督课……仍书如故”。这分明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潮流之中异端的典型，一个黄毛小儿，其言其行，也大有嵇夜叔似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性格，他真正有些无法无天了。

无论是兄长的反对，还是乡邻的白眼，对蹇栋宇来说，都无所谓了，他放浪于山水之间，数十年以后，他还记忆犹新，“尝语侍者曰：我在家时已作行脚僧了”。

另据《破山语录》卷二十一《行实》中他的自述，一日，他行至一芥小庙，“见壁间有《志公禅师劝世歌》，予读至身世皆空处，不觉堕泪如雨，将从前恩爱等事，一时冰解”。《志公禅师劝世歌》里面有“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云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公”；“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夜静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看将起，便是南柯一梦中，不信但看桃李树，花开能有几时红。直饶做到公卿相，死后还归泥土中。身归土，气随风，一片顽皮裹臭脓”的句子，因此，使他越读越感到自己身心俱无，轻飘飘地犹如天边浮云，刹那间风吹云散，只落得空空如也。什么生与死、苦与乐，什么名和利、贵和贱，不过是泡影般没有意义的一场空，蹇栋宇嚎啕大哭之后，心里反倒有一种超然的空静和异样的轻松。“至夜获一梦，如四山相逼，中间只有一路，有一僧对予诵偈云：欲脱娑婆出苦廛，急须精进莫贪眠，声声只把弥陀念，自有莲华托上天。诵毕不见”；“当夜醒来，自此一心念佛，志愿出家”。佛家弟子，特别是禅门中人，从某某大师处或某某佛经，突然接触，便“一闻言下大悟”的例子举不胜举，就是寻常人也有因某一句话而影响终生的事情。蹇栋宇所受《志公禅师劝世歌》的影响自不必说，他已然由一个佛门的徘徊者，变为“志愿出家”的皈依者，就是在他游学江南成名之后，路过南京，还去拜谒志公禅师的道场，并咏诗遣怀以记之，这当然是后话了。

蹇栋宇早“闻姜家庵大持和尚精严戒律，高志有德”，于是便慕名前往，大持和尚见他生得“志气轩昂，英姿出类，命名‘海明’，号‘旭东’，如日轮东升，照天照地之意”（《破山年谱》）。但指派他从庵中“容光长老为徒”。

从此，海明便开始了他的佛门生涯，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5），他十九岁。

第二章，漫游求学的青年时期

一、上下求索

姜家庵只是在大竹算得上香火较旺的庙子，海明感兴趣的佛教经籍十分有限，惟一能够讲经说法的大持和尚在海明来后“不上数月”即已圆寂西去了。容光长老的学识见解远远不能令他的这位弟子安心于庵中，这时，偏逢比邻的邻水县“延福寺慧然法师讲《楞严经》”，海明向容光靠辞后，欣然

前往，“听经至‘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讲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处，自谓我出家原为生死，生死岂不是轮转意。若不受轮转，毕竟要知常住真心，则不受轮转，则不惧生死。如此将十卷《楞严经》熟读一过，在七处微心，八还辨见文中恍有人处，只是一味道理印证。又闻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谓之教外别传。此旨幽微，卒难玄会”，一天，海明趁众人散去，院落空静之时，单独到内室向慧然法师请教。法师见年轻人有志于学，喜不自禁，便耐心而细致地给他讲解楞严太义，并“以因缘譬喻，种种开示”，不料这位学生太刁钻了，几番问答论辩，平日头头是道的慧然竟乱了方寸，不知所云。海明从内室出来，“只是不决其疑”，惟有摇头苦笑，这样以其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心头的疙瘩无法解开，第二天，他留下一首偈子，便扬长而去：

我为生死来出家，何须更算海中沙。
无常杀鬼卒然至，锦绣文章乱似麻。

（《破山语录》卷二十一）

带着满腹的疑惑，海明走出福延寺，四顾茫然。大持和尚业已作古，姜家庵已没有回去的必要，家乡也无须留恋了。他不是委身佛门碗饭吃的流民，也非躲进深山自得安逸的闲人，他之所以出家，就是要超越人间的琐屑，解脱世俗的烦恼，证明宇宙人生的真理，况且究理穷源是他与生俱来的心性。天高地迥，日白云黄，他相信定有高人能拂去他心头的密云。

为寻求大法，二十出头的海明背负行囊，只身“瓢笠出川”，走出了四围高山的巴蜀。

他且走且停，寻师访道，来到荆南（今属湖北），偶然间认识了一位和他一样浪迹天涯的僧人，相与结伴而行。正值苦夏时节，当他们走到“蕲水吴王庙”时，海明不幸“患痢疾，同行别去，无人相顾”，正在举目无亲，孤苦难耐时，吉人自有天相，“偶有居士张棱溪者，见师（海明）虽病，眼光射人，遂延至家中，以药调理三月余，病愈及辞谢”（《破山年谱》）。

辞别恩公张棱溪后，海明迈步向黄梅破头山走去。

二、破头山上

海明“行至黄梅破头山，见泉石幽深，遂缚茅屋”。这里远非昔日所游的各处道山可以比拟。这是他心仪已久的圣地，是六祖慧能的求法得道的地方，是远近游僧聚集的所在。海明寓身山间，终日“草衣木食”，夜以继日，攻读佛教典籍，并用心领会其中玄而又玄的奥妙。

破头山亦称破额山，因为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关系，初唐以来即已名标史册，成为禅宗事实上的发祥地。据佛教文献记载：四祖道信在破头山建立禅宗门庭时，一位栽松老人对他说：可以为我传法吗？道信大师说：你太老了，既使能够了悟佛法，也只能自了而已，不能担当弘法的大任，你若真有此心，转世再来，我可以等你。栽松老人听后扬长而去。过了些年，道信出游归来，仍住破头山，一日偶去黄梅县，见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童”，便问他：你姓什么？小儿答道：姓即有，不是常性。道信追问道：那会何姓？他说：是佛性。道信再问：你没有姓吗？他说：性空故无。道信心中默然，知其必是前番栽松老人，便找到他的家里，乞化出家，他“父母以宿缘故，殊无难色，遂舍为弟子”，道信大师便为他取名叫弘忍。弘忍开创东山法门，成为得道高僧，被尊为五祖。又过了许多年，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氏慧能因慕弘忍之名，投奔破头山来。慧能三岁丧父，以卖柴为生，不识文字，但对佛法的悟性极高。来破头山的路上，有一个叫无尽藏的比丘尼因学《涅槃经》生疑向他请教，先问字，他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无尽藏说：字尚不识，曷能会义？慧能答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于是受到大家的钦佩。慧能初见弘忍，弘忍问他哪里人，来求什么？他说是岭南新州百姓，来求作佛。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若为（如何）堪作佛！他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暗自惊诧而又不露声色，只教他在寺内随

众作劳役，踏碓舂米。数月之后，恰逢弘忍考察弟子们的学问功课和佛法心得，以便确立弘扬大法的接班人。考察内容就是让大家各作一偈，以见心性。首座弟子神秀先作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见了，认为“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慧能对神秀的偈子也不以为然，但他不识文字，于是便请人代书了他作的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人见后莫不惊讶，弘忍也深以为然，为避免惹起风波，便叫慧能深夜入室，为其传法，并付法衣，定他为第六祖。慧能为避争端，星夜下山，隐遁于四会、怀集一带十余年。后至广州法性寺，偶值风吹幡动，为风动或幡动引起辩论，慧能走向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全场大惊。后来慧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一改他师父师祖静坐、观心、摄心的传统方法。并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

这些公案综合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资料，佛门史料中夸大其辞，穿凿附者多，但慧能名为禅宗第六祖，实为禅宗创始人则是世所公认的事情。海明之所以跋山涉水，奔破头山而来，恐怕与前面这几位祖师不无关系吧！

海明在破头山中一住便是三年。由于几位祖师创造的辉煌的历史，使得从各地前来参拜学法的禅人游侣自然不少，大小寺院的藏经藏书应该说也十分的丰富了。海明从偏远的川东而来，大可一饱精神的饥渴，三年下来，不用说佛门要典，即是古人“语录”、“公案”之类，也早就烂熟于胸。但往往学识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思绪不畅的痛苦也会随之而来。虽然海明素有读与思并重的学习方法，但贪多嚼不烂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学问不能打通，好似身陷迷魂阵中不能自拔，当然苦不堪言。

据《破山语录·行实》所述，这时，他感到了空前迷惘，要想借助前辈大师来解决，但“每看古人公案、语录，一发如银山铁壁一般”、“只是胸中断结不开，昏沉散乱”，他从来就是不肯服输的人，他内心发誓道：“若不明此事，终不落此山”。海明决定从头开始，把各种佛书禅话统统撂在一边，将南宋高峰原妙的《高峰语录》为旨归，“以七日为期，刻期取证”。高峰认为，“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这“一疑”就是“一归何处”。只要解决了这“一疑”，就是成佛成祖，绝对自由。高峰说：“大彻底人，本脱生死，因甚命根不断？佛祖公案，只是一个道理，因甚有明与不明？大修行人，当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高峰原妙禅师行状》）。这就是他著名的“三关语”，其中心是引导人们参透生死和解脱生死。

当时依他法子做了四五日，两眼昏花，脚手无力，行路似云浮空也。不惊恐，不怕怖，只是这些无意味的语疑不自决，如有气死人一般。一日发极到万峰悬崖上立定，自誓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时立起，立到未时之际，眼前惟有一平（坦）世界，更无坑坎堆阜，意欲经行，不觉堕落岩下，将足损了一损。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密举从前所疑所碍者，如获故物。方放身睡到天明，高声叫云：屈屈。有一居士诣前云：师傅脚痛么？予以劈面一掌云：非公境界！（《破山语录·行实》）。

定下期限，不成功则成仁，这种自我较劲的方式犹如给自己下最后的赌注，实在是够狠的，它在世俗生活亦被人们普遍应用，作孤注一掷的打算。而那种苦行僧的做法在古印度就很流行，僧侣用饱尝身体的痛苦——甚至自残，去忘却精神的痛苦，以求得觉悟。不过，海明所坠落的悬崖大概不会太高，否则便性命难保。人们的生活往往太寻常，寻常的生活往往缺乏刺激，而每当性命交关，生离死别之际，人们对人生的认识就往往会超乎寻常。海明僵卧禅榻，腿的痛苦自然免不了，但生死事大，亦将置之度外，它又算什么呢？他似乎已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宫，置身“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步，前面就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境界，他只觉得以前那些翻来复去，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烦恼与挂碍跑得无影无踪，心里犹如桶底打脱一样的空净，身体犹如包

袱放下一样轻松，他不再迷信佛祖的教条，不再执着大师的理论，也不再限制自己的思想。于是放身睡去，直到日上三竿，还放肆地大叫“唉哟”，那位不识相的居士以为他真的疼痛难忍，前来询问，当然此之所谓痛已非彼之所谓痛，海明将他轻轻推开，说：你不懂。

“悬崖敢撒手”、“肉体下降，灵魂飞升”，这类证悟方式在佛门不算少数，各有奇异之处。海明所受的只是并无大碍的皮肉之苦，百日之内即完好如初。

无论是为纪念破头山三年学法的经历，抑或是调侃自己破壁落山的举动，他便有了“破山”这个法号，破山和尚的大名如雷贯耳，名动天下，大概是由此而始。后来有人认为破山身为明朝遗民，见国家破灭，山河易主，故自号“破山”，承“国破山河在”之意，以唤起民众反清复明的斗志。破山长用此号，也许会有这方面的意义，对世人以表暗示和警醒，但毕竟只是一种巧合，“破山”法号的使用却早在明亡的二十余年之前。

破头山间三年的清苦生活对他来说，不异于脱胎换骨。草衣木食，孤灯夜雨，使他的学识更系统，眼界更宽广，思想更丰富了。这为他日后参拜各山的大德高僧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破山对破头山念念不忘，后来在应一徒儿之请所作的诗，极为写实地道出了他当年的生活状况：

曾住破头山，虺羸甚不堪。
口唇犹剥枣，病面若藏相。
榼松火供暖，毳毳衣避寒。
龙天推出世，留与在人间。

（《破山语录》卷十七）

其实，此时的破头山早已今非昔比，虽僧多庙广，但“流水落花春去也，更无消息”。没有什么杰出人物了，除自学自参佛法之外，在史料中找不到破山结识禅友，参拜高僧的记载，大概是他认为没有参拜结识的必要，或即使参拜结识过，而没有留念和记载的必要。——佛门的重心已转移到了东南，那里才是明末高僧云集之地，当然，它即将会成为破山下一个目标所在了。

刚刚走下破头山的破山，匆匆向东方走去。面对群山的耸峙，他似乎毫无惧色。这个四川来的乡巴佬，俨然是一个自去自来，不古不今，脱洒出尘，笑傲云天的狂人。幸好禅门之内，桀傲不驯早有先例，喝祖骂佛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三、大师门庭

自万历以来，禅宗扭转了明朝中叶下衰的颓势，高僧林立，各阐其宗，其流行的中心，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营党结社最发达的东南地区，由于派系之间争论激烈，亦显示出思想开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云栖株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被人们称为“明代四大高僧”，但事实上影响更大更远的除云栖、紫柏、憨山外，当推临济宗传人密云圆悟和曹洞宗传人湛然圆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说：“自万历后高僧辈出，云栖、紫柏、密云、湛然各阐宗风，呈佛教复兴之象”。总之，“从明万历（1573）到清雍正（1723），禅宗打破了以往的沉寂，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它在中国封建主义历史上最后一个兴盛期”。（《中国禅宗通史》）。

破山身逢其盛，使他有机会在早年就能够往来于各个大师之间，吸其灵气，受其感染，得其神髓。天启二年（1622），破山二十六岁，他马不停蹄，一年之内就参拜了憨山德清、无异元来、闻谷广印、雪峤圆信四位在佛教史赫然昭著的大师。

憨山德清（1546—1623），四大师之一。他虽是禅门宗匠，却不受一宗一派之拘束，倡导禅净双修，致力于华严，对参禅念佛，有独到的见解：“所云坐禅，而禅亦不属坐。若以坐为禅，则行住四仪